

欧洲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主办

杨娜 程弘毅

议题外溢与形式转换：理解欧洲一体化的动态视角

于宏源 李铭泽

供应链震荡视阈下欧盟全球资源运筹的战略转向

王天凡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黄萌萌

德国外交角色的变迁：从“文明力量”到“建构力量”？

宋亦明 吴泽平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

宋亦明 吴泽平

内容提要:挪威通过大规模的能源开发与出口实现了傲视全球的经济增长,而其他绝大多数能源出口国则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的“能源诅咒”。本文运用以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研究表明,挪威属于较早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其各个产业基本以原生型模式自主发展,而政府并未对石油产业进行大规模干预。这导致其石油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相对平衡,并且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因此,挪威石油产业从未缴纳超额的税收和外汇以及直接向其他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影响挪威选举并与政治家进行利益交换。这使得挪威有效阻隔了生成“能源诅咒”的主要病理渠道并形成了多元均衡的产业布局。得益于此,挪威既能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又能有效缓解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进而实现了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关键词:挪威 “能源诅咒” 经济现代化 产业联盟 产权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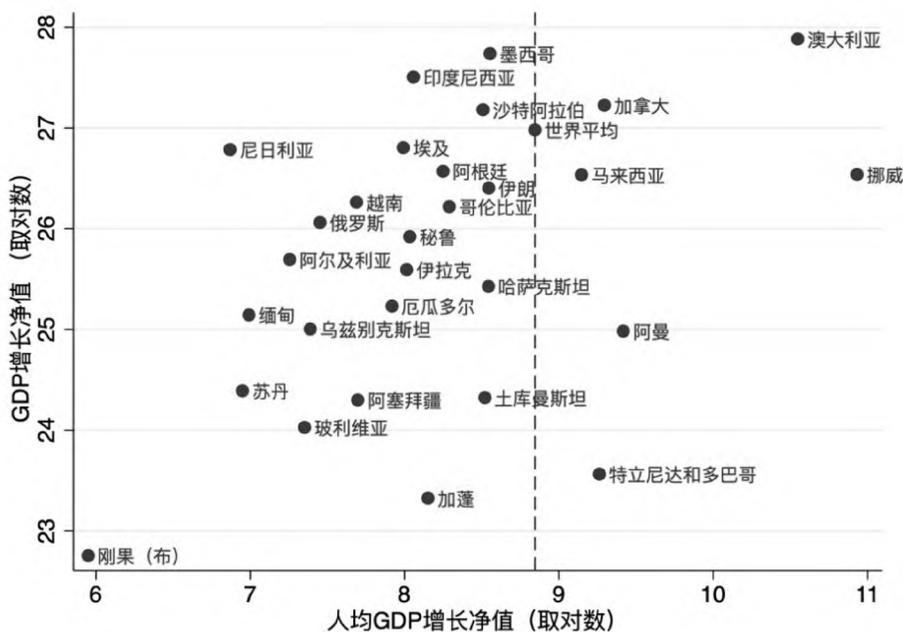
一 引言:找回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能源出口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失衡问题逐渐凸显,业已形成难以弥合的发展鸿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能源出口国落入经济增长趋缓、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一带一路’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政治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ZX0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项目批准号:2022QD041)的阶段性成果。李巍、罗斯(Michael Ross)、王正毅、王明进、郑宇、田野、赵晨、黄琪轩、夏敏、陈占明、周强等对本系列研究的初稿提供了建设性指导。贾瑞霞、叶成城、周文戟、科尔根(Jeff Colgan)、史密斯(Benjamin Smith)等接受了笔者的学术访谈。林小琪查阅整理了挪威语的文献资料。本文曾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上海论坛上宣读,并得到胡鹏、陈超等与会者的有益批评。《欧洲研究》匿名审稿人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笔者在此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停滞甚至衰退的发展陷阱中,而以挪威为代表的能源出口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实现了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① 对世界上 39 个主要能源出口国的统计显示,仅有 6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增长净值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挪威的增长净值独树一帜,详见图 1。^② 如果将能源开发与出口拖累经济增长、诱发发展陷阱的病理现象称为“能源诅咒”(Energy Curse)的话,那么显然挪威

图 1 1960—2021 年能源出口国 GDP 与人均 GDP 增长净值



资料来源: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Constant 2015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 World Bank, “GDP(Constant 2015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

^① 该领域研究最早的推动者理查德·奥蒂(Richard Auty)曾指出:“新的证据表明,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无法从有利的禀赋中获益,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甚至可能比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还要差。这种违反直觉的结果是资源诅咒论点的基础。”参见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Routledge, 1993, p.1。对上述经验现象的概述,参见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d Anthony J. Venables,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a Windfall,”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4, 2012, pp.316-318。

^② 主要能源出口国的判断标准为一国是否长期、实质性、大规模出口能源。对这三个指标具体的操作参见宋亦明、邹仪婷:《“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基于产权制度的解释》,载《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4-115页。39个国家名单及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数据可参见宋亦明等:“能源富裕国主要社会经济数据”,<https://sym915.github.io/data/>。另需说明的是,部分国家的增长净值为负数无法进行对数运算,因而未显示在图1中。

并未陷入“能源诅咒”的泥淖。基于此,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挪威有何独特之处使其有别于其他能源出口国而隔绝“能源诅咒”?^① 挪威借助该因素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是什么? 其他能源出口国能否借鉴挪威的经验并通过相应举措缓解或者摆脱“能源诅咒”?

既有的多项研究也试图揭示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聚焦挪威经济依赖与要素投入的功能性解释。相应的研究发现,挪威政府实施的产业关联性政策降低了能源产业的“飞地属性”;高度注重国民教育对冲了能源开发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通过研发支持等推动非能源产业发展进而最大限度地减缓了“荷兰病”(Dutch Disease)的“去工业化”病症。^② 第二类为侧重挪威国家治理与政治制度的分配性解释。相应的研究认为,挪威相对发育完善的民主体制提供了其他大多数能源出口国所不具备的经济发展基础;建立了规范的能源监管制度,避免了寻租和腐败的大量滋生;通过能源主权财富基金确保能源出口收益实现代际传递而非被当代的少数个体所侵蚀。^③ 总体来看,虽然上述研究为理解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提供了诸多借鉴,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解释边界无限延展且过分叠加。这些研究不仅放大了单一因素对挪威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往往将解释边界本已

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所以用“隔绝”而非“缓解”“缓和”“避免”“破除”等词来描述挪威的能源产业开发与经济增长情况,有两个原因:其一,伴随着能源出口,“能源诅咒”的病理效应必然存在,所以它只能被隔绝,而不能被避免和破除;其二,缓解及缓和不足以在程度上刻画挪威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② 田德文:《列国志:挪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182页;Steinar Holden,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Energy Policy*, Vol.63, 2013, p.874; Simon Ville and Olav Wicken, “The Dynamics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orwa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2, No.5, 2013, p.25; James E. Alt, “Crude Politics: O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mployment in Britain and Norway, 1970-85,”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7, No.2, 1987, p.187; Ragnar Torvik, “Why Do Some Resource-abundant Countries Succeed While Others Do No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25, No.2, 2009, p.249; Erling Røed Larsen, “Escaping the Resource Curse and the Dutch Disease? When and Why Norway Caught up with and Forged Ahead of Its Neighbor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65, No.3, 2006, pp.616-620; Hilde C. Bjørnland and Leif A. Thorsrud, “Boom or Gloom? Examining The Dutch Disease in Two-speed Econom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25, No.598, 2016, p.2223; Andreas R. Dugstad Sanders and Pål Thonstad Sandvik,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Democra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Norway since 1900,” in Marc Badia-Miró, Vicente Pinilla and Henry Willebald, e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Learning from History*, Routledge, 2015, p.313.

③ Andreas R. Dugstad Sanders and Pål Thonstad Sandvik,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Democra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Norway since 1900,” p.313, 332;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84, 189; Steinar Holden,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p.872; Klaus Schmidt-Hebbel, “Fiscal Institutions in Resource-rich Economies,” in Ibrahim Elbadawi and Hoda Selim, eds., *Understanding and Avoiding the Oil Curse in Resource-rich Arab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66-270; 景普秋、范昊:《挪威规避资源诅咒的经验及其启示》,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4期,第148-152页; Erling Røed Larsen, “Are Rich Countries Immune to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Norway’s Management of Its Oil Riches,” *Resources Policy*, Vol.30, No.2, 2005, p.83; Ole Andreas Engen, Oluf Langhelle and Reidar Bratvold, “Is Norway Really Norway?” in Taleh Ziyadov and Brenda Shaffer, eds., *Beyond the Resource Cur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268.

过度延展的单个因素逐一罗列,最终导致对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讨论变成罗列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大杂烩。其二,对挪威经济增长的历史性根源明显忽视。这些研究拘泥于探索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直接原因,但对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因素的讨论则较为单薄。

实际上,能源出口国能否隔绝“能源诅咒”的问题就是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现代化理论对此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维度,工业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① 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人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是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而无法持续推动工业化的国家很难取得长期和稳健的经济增长。^② 据此,能源出口国过于依赖能源产业、无力持续推动工业化进程是其陷入“能源诅咒”的直接原因。就经济增长的形态而言,现代化进程对国家内部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深远的塑造力,而这种塑造力的产生与否取决于国家何时迈入现代化进程的门槛。^③ 据此,在讨论能源出口国之所以无力调整经济结构、无力推行多元化的产业政策时,研究者不能也不应回避现代化始点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塑造作用。总之,现代化的视角是理解国家发展形态与经济绩效的重要钥匙。^④ 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能源出口国能否隔绝“能源诅咒”,需要在相关分析中“找回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基础”。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上述不足,本文在借鉴现代化理论洞见的基础上,搭建以经济现代化始点为自变量、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进行阐释。^⑤ 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国家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早晚极大地影响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往往采取政府直接强力干预经济的“追赶型”发展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催生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建立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以及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使其能源产业有能力且必须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进而使得政府与政治

① 叶成城:《理解早期西欧现代化:概念、动力与机制》,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56-60页; [美]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211页。

② [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美]霍利斯·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郑宇:《全球化、工业化与经济追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第109-112页。

③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63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⑤ 宋亦明、张经纬:《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2期,第82-120页;宋亦明、邹仪婷:《“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基于产权制度的解释》,第93-137页。

家对能源产业形成病态的依赖,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形成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最终会在国内层面拖累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在国际层面放大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上述影响致使国家陷入“能源诅咒”。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尝试分五个方面探讨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根源及产业逻辑:第一部分回溯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的条件和进程,大致明确其经济现代化的始点;第二部分阐述与经济现代化始点伴随而来的能源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第三部分分析能源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政治效应,并观察挪威是否最终形成了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第四部分探讨这种产业结构对近年来挪威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 走向现代:挪威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与进程

在 19 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有利于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先后出现。第一,挪威的商业船队在 18 世纪末期迅速发展,其装载量在 60 年内增加了 6 倍,在 19 世纪中期已成为具备强大远洋运输能力的世界第三大船队。^① 发展良好的航运业促进了挪威初级产品的出口,也帮助挪威从英国进口了大量先进的工业制成品,使其享受到工业革命的资本和技术红利。第二,大量外资的流入是挪威快速建立产业基础、增加国内资本积累的重要初始条件,直接推动了挪威工业部门的发展。在经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外资占挪威全部工业投资的 39%。其中,作为挪威现代工业体系重要基础的电力工业的外资比例达 50%,而矿业和化学工业的外资比例更是高达近 80%。^② 第三,挪威民众展开了“侯格主义运动”(Haugianism)、“瑟雷恩运动”(Thrane Movement)和“农场主的朋友们运动”(Farmers' Friends)等反对路德教官员的温和运动,提出了具有现代精神的一系列政治诉求。^③ 这一方面促进了挪威的宗教自由,推动了大众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发展,并努力将其转变为有形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使挪威民众紧密团结,萌发出朴素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经济自主观念,为经济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以上有利条件的出现,挪威的经济与社会面貌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发生明显

^① Ivan Bere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Divers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49.

^② Ivan Bere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Divers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p.251.

^③ 张琳:《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第三届〈哲学分析〉讲堂”综述》,载《哲学分析》,2013 年第 1 期,第 157-162 页。

的转变。首先,19世纪50年代以来,挪威的产业结构逐步完成从以农业为基础到以工业为基础的过渡。航运业成为挪威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挪威的商船总吨位已逾百万,采矿、冶金、造纸和电力产业也在外资的帮助下开始迅速发展。^①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方面,挪威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由18世纪的75%左右下降到1890年的51%,而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从业人口在1890年也超过其全国劳动人口的20%。

其次,自19世纪50年代起,挪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866年至1870年间挪威的GDP增长13.7%,人均GDP增长10.6%,与18世纪到19世纪前期缓慢的GDP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五年间的高增速也并非昙花一现,按不变价格计算,挪威的GDP和人均GDP在1866年后的40余年时间内均维持了正增长态势。^②在人均收入方面,1870年至1910年是挪威的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期,按不变价格计算,该时段内挪威人均收入增长61%。尤其是1870年至1875年间,挪威人均收入增长14%,上升速度远超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③

最后,受益于挪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部门的勃兴,19世纪中期挪威人口和城市化率的迅速增加。其一,在人口数量变化方面,19世纪50—60年代是挪威的人口快速增长期,挪威人口由138万增至173万。尤其是1850年至1860年这10年间,挪威人口增长达20万。^④其二,在人口增长率方面,1815年至1860年间挪威的人口出生率稳定在3%以上,死亡率降至2%以下,由此保持了1%以上的人口增长率。19世纪50年代末期,人口增长率更是达到1.7%的峰值。^⑤其三,在城市化水平方面,1860年到1910年间挪威的城市化水平由15%增至29%,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仅次于丹麦。^⑥

产业结构转向以工业为主、经济增速加快以及人口和城市化水平提高都是印证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多位学者也对挪威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始点进行了研究。例如,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教授K.G.希尔德布兰德(K.G. Hildebrand)将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经济现代化的时间框定在1850年至1914年,认为19世纪中期这些国

①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 下册)工业社会的兴起》,吴继淦、芮苑如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④ Statistics Norway, "Population,"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5803>.

⑤ Ibid.

⑥ 田德文:《列国志:挪威》,第119页。

家发生了“经济关系的大转变”。^①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伦纳特·约伯格(Lennart Sjöberg)根据挪威人均 GDP 在 1870 年至 1875 年出现猛增,判断挪威于 1870 年左右开始了经济现代化进程。^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名誉教授伊万·贝伦德(Ivan Berend)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指出挪威的纳维亚国家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发生了轻微的经济转型,但直至 1870 年才实质性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③ 在参考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挪威在产业结构、经济增速和人口变化上的上述数据,推断出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的始点约为 19 世纪 50 年代。因此,挪威属于第二波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显然是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发达国家,^④对后来形成的石油产业联盟形态与石油产权制度类型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 挪威的石油产业联盟形态与石油产权制度类型

自 19 世纪 50 年代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后,挪威通过百余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⑤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挪威石油产业走上蓬勃发展之路。挪威政府制定了允许分配许可证的石油开发体制,组织外国石油公司对近海大陆架展开石油勘探活动,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等跨国石油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勘探任务。^⑥ 1968 年至 1969 年,科德(Cod)油田和艾考费斯克(Ekofisk)油田相继被发现,而后者在 1971 年的正式投产则标志着挪威迈入石油经济时代。20 世纪 70 年代,出于削减外国石油公司控制权和發展本国石油开采技术的需要,挪威政府颁布了“石油十诫”(the Ten Oil Commandments),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挪威石油局以及以石油和能源部为主导的石油管理体制,通过暂时的国家指导帮助石油产

① [英]彼得·马赛厄斯、[英]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英国、法国、德国和挪威的纳维亚》,徐强、李军、马宏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60、769 页。

②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 下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 2-15 页。

③ Ivan Bere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Divers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pp.239-251.

④ 叶成城、唐世平:《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法与理论》,载《学术月刊》,2021 年第 5 期,第 85 页。

⑤ Simon Ville and Olav Wicken, “The Dynamics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orway,” p.1352.

⑥ Ole Andreas Engen, Oluf Langhelle and Reidar Bratvold, “Is Norway Really Norway?” p.261; Hilde C. Bjørnland, Leif Anders Thorsrud and Ragnar Torvik, “Dutch Disease Dynamics Reconsidere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119, 2019, p.413; Anne Margrethe Brigham and Jonathon W. Moses, “Den nye oljen,” *Norsk statsvitenskapelig tidsskrift*, Vol.37, No.1, 2021, p.10.

业探索总体发展方向。^① 挪威政府一方面对新的石油开发许可证颁发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也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向挪威企业和公共部门传授石油开采技术,逐步推进石油开采的“挪威化”进程,以便挪威石油产业快速步入私人产权制度下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阶段。^② 目前,虽然挪威的石油产量仅占全球的2%,但却是欧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数十年来为欧洲提供了持续且稳定的能源供应。^③ 2021年,挪威石油产量达9.38亿吨,占欧洲石油日产量的58.55%。^④

值得注意的是,挪威石油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后,政府很快减少了对石油产业的直接介入,取而代之的是授予能源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其主要原因有四点:首先,挪威较早地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因而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呈现出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所说的协调体系的特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形成。^⑤ 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挪威于1814年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后于1884年建立议会制和内阁制,形成了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20世纪60年代以来,挪威逐渐走向多党联合执政的道路,并产生了具有强大政策影响力的众多利益集团,逐步建立了致力于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制度相适应,挪威建立了较为典型的混合经济制度,强调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减少以行政干预方式进行的经济调控。挪威的政治经济体制呈现出平等和理性的色彩,基本符合协调体系的特征。这有利于通过地方的创新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建立私人或公私合营性

^① Steinar Holden,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p.876; Mark C. Thurber and Benedicte Tangen Istad, “Norway’s Evolving Champion: Statoil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Enterprise,” in David G. Victor, David R. Hulst and Mark C. Thurber, eds., *Oil and Governa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World Energy Supp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99; Svein S. Andersen and Ole Gunnar Austvik, “Norge som Petroleumland—Modent for Endring,” <http://www.kaldor.no/energy/mdu2000-11r21.html>. 1972年,挪威国家议会通过了石油开采的10项基本原则,包括确保国家的监督与控制、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并建立石油工业基础和注重环境保护等内容,被称为“石油十诫”。

^②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p.187. 另需注意的是,Statoil于2018年改名为“Equinor”,为避免混淆,下文仍沿用原名“Statoil”。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EU-Norway Statement on Strengthening Energy Cooperat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3975; Norwegian Petroleum, “Exports of Oil and Gas,” <https://www.norskipetroleum.no/en/production-and-exports/exports-of-oil-and-gas/#:~:text=Norway%20now%20supplies%20about%20%25%20of%20global,day%29%20was%20delivered%20to%20onshore%20facilities%20in%20Norway.>

^④ 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年版》, https://www.bp.com.cn/content/dam/bp/country-sites/zh_cn/china/home/report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22/bp-stats-review-2022-full-report_zh-resized.pdf。

^⑤ 阿普特指出,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早的国家在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后尤其需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由此建立了向社会提供更多信息的“协调体系”;相反,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晚的国家迫切需要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经济增长,因而更关注获得权威的问题,进而选择建立更容易压制社会的“动员体系”。详见[美]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1页、第27页。

质的企业,进而形成私人产权制度。

其次,挪威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因而其资本要素较为丰裕,保证私人商业团体筹集到足够的资本进行石油开发。挪威的手工业和造纸、金属冶炼等工业发展基础良好,为石油开发积累了相对充分的剩余资本。拜罗克的人均工业化指数显示,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即成为资本充裕国家,且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① 1969年,挪威私人商业团体控制了所有实际资本要素的61%。^② 1972年,挪威私人商业团体筹建了萨嘎(Saga)石油公司,该公司产值仅次于 Statoil 和海德鲁公司(Hydro),排名第三。除国内资本外,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私人资本也对挪威石油产业发展提供了融资支持。1965年挪威政府颁发首轮海上勘探许可证时,外国石油公司就持有91%的份额。^③ 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挪威凭借丰富的石油储量和透明的监管制度成为跨国石油公司的新宠。此外,挪威于1994年签署了“欧洲经济区”(EEA)协定,更为深入地参与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极大地便利外国资本流入挪威,使其本国石油产业无须完全依赖政府资金进行生产和投资。

再次,由于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挪威已经形成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和基本稳固的税收基础,因此,政府对石油产业征收超额税收的动机并不强烈。20世纪70年代以来,挪威形成了较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作为该国传统优势的渔业和航运业仍具有国际竞争力;与石油产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蒸汽供应产业实现了持续平稳发展,构筑了挪威第二产业的基石;信息与通信产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和新能源产业则在近二十年发展迅猛,成为挪威先进技术和创新活动的代表。在税收结构方面,挪威政府对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缴款和商品及服务税制定了较高税率,将其作为国家税收基础,而对企业税和财产税征税较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统计显示,2020年社会保障缴款占挪威政府总税收的29%,商品及服务税占比为32%,收入、利润和资本增值税占挪威政府总税收的36%,其中个人收入、利润和资本增值税占29%,企业收入、利润和资本增值税仅占6%。其中石油公司占企业税评估税额的70.7%,陆上活动公司、电力公司和金融公司贡献了其余

① [美]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2页;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11, No.2, 1982, p.281, 330。

② Thorvald Gran, *The St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Case of Norway 1850-1970*, Ad Notam Gyldendal, 1994, p.179。

③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p.183。

29.3%的税额。^①在税收总额方面,挪威在近20年时间内税收占GDP的比重稳定在40%左右,且显著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②

由上可知,挪威政府税收收入来源多样且税额稳定,缺乏对新兴的石油产业征收额外税收的动机。挪威石油和能源部白皮书《未来产业——挪威石油活动》指出,20世纪70年代挪威政府在正常公司税收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本国石油企业的税收体系,规定运营设备投资可根据直线折旧法在投资开始后的六年内注销。^③与勘探、研发、融资(债务)、运营和搬迁相关的成本均可按此规定扣除,不必缴纳特别税。该规定同时适用于参与挪威石油开发的外国石油公司,从而较好地保障了国内外石油开发者的税后利润。^④1975年,挪威政府引入“定额价格”制度计算公司的石油收入,其目标是避免在属于同一家公司的生产者 and 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易时价格被高估,从而降低需要征税的净利润,增加石油企业的盈利空间。^⑤

最后,挪威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支持工会和利益集团活动,促进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协商合作为特点的“北欧模式”,并未接受亚非拉国家建立的能源国有化规范。在19世纪后期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建立了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意识为核心、以高税收和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在此模式下,挪威构建了以工会为主要组织,在阶级、政党和利益团体之间进行高度集中化的妥协和博弈的社会机制。在该机制中,工会组织代表工人阶级与资方组织开展具体谈判,国家或政府则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协调者”而非“参赛者”的身份参与谈判过程,最终各方以彼此认同、多方妥协的途

① Statistics Norway, “Tax Statistics for Companies,” <https://www.ssb.no/en/virksomheter-foretak-og-regnskap/skatt-for-naeringsvirksomhet/statistikk/skatt-for-selskaper>.

② OECD, “Revenue Statistics 2022—Norway,” <https://www.oecd.org/tax/tax-policy/revenue-statistics-norway.pdf>. 由于原数据四舍五入,可能出现二级指标数据加总后不完全等于一级指标数据的情况——作者注。

③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An Industry for The Future—Norway’s Petroleum Activities,” https://www.regjeringen.no/contentassets/19da7cee551741b28edae71cc9aae287/en-gb/pdfs/stm201020110028000en_pdfs.pdf. 《未来产业——挪威石油活动》是挪威石油和能源部在2010—2011年向议会提交的研究报告,涵盖了油气定价、提高原有资源效率、开发新开采区域、关注环境保护、加强科学研究和规范政府收益等内容。直线折旧法(Straight-line Method)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估计使用年限内平均确认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法。折旧的计算方法是原始成本减去资产的残值,再除以估计的资产使用寿命。直线折旧适用于较便宜的商品,如家具。直线折旧法可以补充其他几种折旧方法,如余额递减法和年数累加法。

④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An Industry for The Future—Norway’s Petroleum Activities”.

⑤ Juan M. Ramírez-Cendrero and Eszter Wirth, “Is the Norwegian Model Exportable to Combat Dutch Disease?” *Resources Policy*, Vol.48, 2016, p.93;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p.193.

径来达成利益目标,反对激烈或暴力的对抗性方式,也防止国家过多干预行业发展。^①

上述社会文化传统在挪威石油行业有着鲜明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期,挪威政府和壳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等通过谈判制定了石油开发的许可证体制。^②70年代,挪威政府推动了石油开采的“挪威化”进程,一方面组织本国石油企业积极向外国石油公司学习,提高石油相关产业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出于培育本国石油开发基本能力的目的,挪威政府适度增加了国家对石油产业的规范和指导,但并未出现强制收购私人产权或干预石油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现象。^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产业的迅猛发展促使“北欧模式”的形成,挪威石油工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政府规定的基本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工资谈判和政策动议。^④在“北欧模式”的规范下,一方面,石油产业的雇主、雇员和政府在经济政策、信息交流和产业的不同层次开展协商合作,减少了强制政策带来的冲突;另一方面,面对“挪威化”进程带来的政府石油收入的增加,挪威政府通过规范政府收益渠道、设立石油基金等方式,保证石油利润的合理分配,促进了挪威产业间和代际间平等。^⑤

综上所述,上述四个因素共同作用,避免了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实力过强,也有利于石油领域私人产权制度的形成。^⑥自20世纪60年代挪威着手石油开发以来,历任政府都出台了石油政策来引导和监管石油产业发展。总体来看,挪威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聚焦于石油开发扶持;在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重视石油收益管理和分配;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关注国际石油合作和环境保护问题(见表1)。

^① 林卡、张佳华:《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第29-32页。

^② Ole Andreas Engen, Oluf Langhelle and Reidar Bratvold, “Is Norway Really Norway?” p.261.

^③ Andreas R. Dugstad Sanders and Pål Thonstad Sandvik,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Democra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Norway Since 1990,” p.344.

^④ Ole Andreas Engen, Oluf Langhelle and Reidar Bratvold, “Is Norway Really Norway?” pp.267-268.

^⑤ Steinar Holden,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p.870; Marianne Takle, “Oljefondet - I Solidaritet Med Framtidige Generasjoner,” <https://www.idunn.no/doi/10.18261/issn.1504-3053-2018-03-04-06>.另需要注意的是,石油基金于2001年更名为“政府养老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为避免混淆,后文仍称石油基金。

^⑥ 与石油产业相比,天然气产业体量较小且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较为类似,因此本文不予讨论。但由于挪威政府对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是合并统计的,下文中关于石油产业联盟的相关数据也包含了天然气产业。

表 1 1965 年至今挪威历届政府的石油政策

首相及其任期	关键石油政策
佩尔·博滕 (Per Borten) 1965—1971 年	确立石油产业的税率为净利润的 10%
特里格夫·布拉特利 (Trygve Bratteli) 1971—1972 年	推进大陆架海底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1972 年建立 Statoil
拉尔斯·科尔瓦尔德 (Lars Korvald) 1972—1973 年	初步划定石油开采作业区; 石油税率调整为 8%—16% 的浮动税率
特里格夫·布拉特利 1973—1976 年,第二次执政	1975 年颁布《石油税收法案》(Petroleum Taxation Act); 对外国石油公司的许可证颁发进行限制,组织挪威石油企业学
奥德瓦尔·诺德利 (Odvar Nordli) 1976—1981 年	习外国石油公司的勘探和开采技术; 规定国有资本在每个油气开采项目中至少持股 50%; 颁布海底石油矿藏征税规定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Gro Harlem Brundtland) 1981 年	推进对石油产业的政府投资;
凯尔·威洛赫 (Kåre Willoch) 1981—1986 年	设立国家直接财政收益 (State's Direct Financial Interests, SD-FI) 规定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1986—1989 年,第二次执政	颁布石油开采渔民补偿守则; 颁布石油税收的“普通税+特殊税”征收规则,普通税税率为 28%,特殊税为 50%
简 P·西塞 (Jan P. Syse) 1989—1990 年	建立石油基金管理石油收入制度;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1990—1996 年,第三次执政	加强对挪威大陆架石油作业的监管; 对石油消耗和未来开采模式进行分析
索比约恩·贾格兰 (Thorbjørn Jagland) 1996—1997 年	强调挪威国家对石油收益进行直接管理; 进一步细化 SDFI 经营规定; 颁布第 72 号石油法令,为许可证制度提供全面法律基础
凯尔·马格内·邦德维克 (Kjell Magne Bondeviks) 1997—2000 年	确立欧洲经济区原油进口及颁布交付登记法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2000—2001 年	加强挪威大陆架上冗余管道和电缆的排查; 允许 Statoil 上市,建立佩德罗 (Petrol) 公司代替 Statoil 管理 SDFI
凯尔·马格内·邦德维克 2001—2005 年,第二次执政	推动石油开采新技术的开发及石油专业知识的普及; 建立 APA (Awards in Predefined Areas) 成熟区块许可证颁发制度; 强调以石油产业为龙头,带动挪威产业协调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实现石油废气零排放; 推进挪威石油产业国际化进程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2005—2013 年,第二次执政	寻找和开发巴伦支海和洛弗顿地区 (Barents Sea-Lofoten area) 的油气资源; 加强对石油收入和产出的监管
埃尔娜·索尔贝格 (Erna Solberg) 2013—2021 年	减少北海石油开发碳排放,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检测; 开展致力于二氧化碳捕获、运输和储存技术研究的 CLIMIT 计划; ^① 与英国开展跨境能源合作,加强清洁能源合作
约纳斯·加尔·斯特勒 (Jonas Gahr Støre) 2021 年至今	计划扩大北极圈内巴伦支海区域油气资源开发,开放 125 个油气区块,新增发放 47 个生产许可证; 与法国、德国在氢能、电池技术、海上风电及碳捕集与封存领域加强合作,增加可再生能源产量,发展绿色产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挪威石油战略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http://no.mofcom.gov.cn/article/ztdy/200503/20050300022216.shtml>; “Facts 2000: The Norwegian Petroleum Sector,”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2000, pp.185-187; “On the Petroleum Activity—Unofficial Translation from Norwegian,”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2004, pp.4-7; “The Revised National Budget 2008—A Summary,”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2008, pp.11-13;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2018, pp.13-21; “Norway’s 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 Plans,”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2020, pp.115-118。

由表 1 可见,相较于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挪威政府对其石油产业采取了相对有限的支持和较为宽松的管制政策,而这对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产生了直接

^① CLIMIT 是挪威为碳储存与捕捉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阐释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计划,力求更快地实现碳储存与捕捉。相关说明详见 CLIMIT, “About the CLIMIT Programme,” <https://climit.no/en/about-the-climit-programme/>。

影响。^①就产业联盟而言,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实力与其他产业联盟相比较为均衡。与英国一样,挪威各个产业通过技术革新与贸易盈利自主发展,政府很少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或积极的产业政策介入经济活动或优先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这种“原生型”的自主发展模式使得这类国家内各个产业的发展相对均衡,由此产业联盟间的实力对比也更为平衡。^②在产业联盟的组织性方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与英美等国主要产业的产业联盟相比,政治组织较为松散,与政府的冲突性较小。挪威石油和天然气协会(Norsk Olje & Gass)是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主要纽带,其成员涵盖了从事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海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公司和近海矿物开采供应商。此外,INTSOK也是挪威石油产业的重要组织,致力于推动产业联盟内的各公司开展合作。^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商业经营和产业合作,同时也通过提交产业发展报告和提供有关许可证制度、劳工报酬和气候变化的发展建议等方式与政府沟通。^④

在产业联盟的人员规模方面,鉴于挪威石油勘探和开采机械化程度较高,石油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大,石油产业联盟规模虽有所增长但同比较为稳定。1995年至2022年,挪威石油产业联盟人数由2.4万增长至6万以上,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65%。^⑤但同期挪威劳动力总数由210万增至294万,由此推知石油产业联盟在劳动力总数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1%至2%。^⑥

在产业联盟的工资方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与其他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差距并不悬殊,呈现出与其他产业工资相同的变动趋势。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其对欧洲小国的研究中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挪威通过集体自由协商体系和团结一致的工资联合政策进行了工资控制,避免了产业间工资差异过大的问题。^⑦统计显示,20世纪90年代,石油产业联盟的平均工资比其他产业联盟每年高出

① 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分别对其石油产业的深入介入与管制的讨论,详见 Stacy Rentner, "Venezuela: How a Hydrocarbons Law Crippled an Oil Giant," *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Vol.27, No.2, 2004, pp.351-366; [美]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美]唐纳·马里·达里奥:《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徐洪峰、李洁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②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9-63页。

③ 2017年,INTSOK与致力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产业组织INTPOW合并组建了“挪威能源合作伙伴”(Norwegian Energy Partners)。

④ Norwegian Energy Partners, "The Board 2021," <https://www.norwep.com/About/The-Board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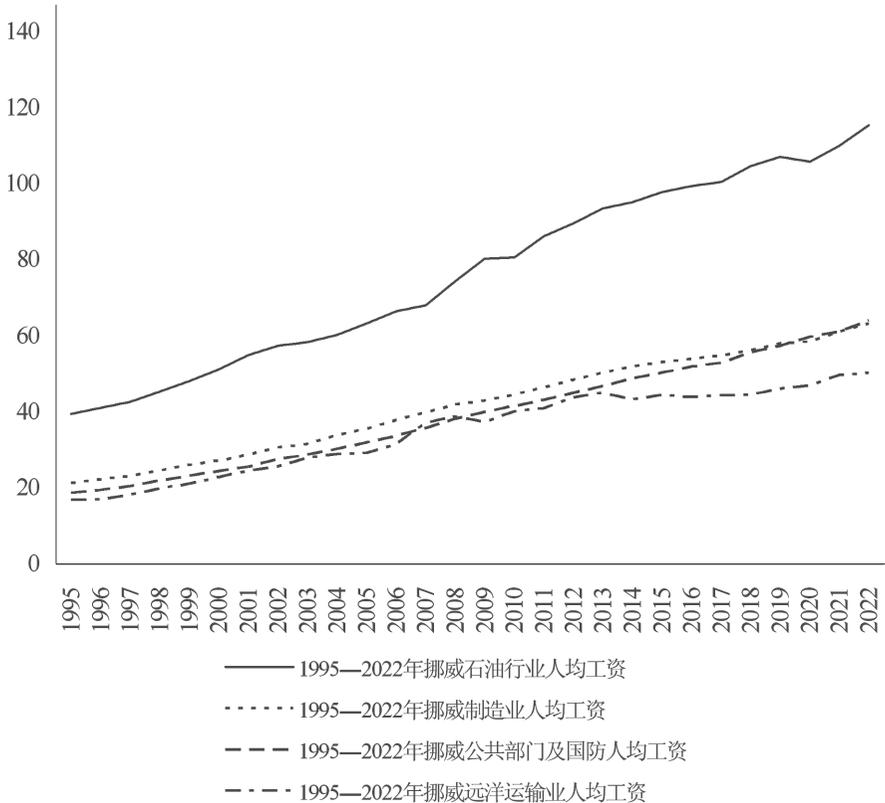
⑤ Statistics Norway, "Wages and Employment, by Industry,"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9175>.

⑥ Hilde C. Bjørnland and Leif A. Thorsrud, "Boom or Gloom? Examining The Dutch Disease in Two-speed Economies," p.2221; Hilde C. Bjørnland and Leif A. Thorsrud, "RINGVIRKNING Norsk økonomi og olje," https://biopen.bi.no/bi-xmlui/bitstream/handle/11250/2366310/CME_wp2013_07.pdf?sequence=1.

⑦ [美]彼得·J.卡岑斯坦:《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欧洲的产业政策》,叶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47页;Jonas B. Bunte, "Wage Bargaining, Inequality, and the Dutch Disea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0, No.4, 2016, p.681。

18万挪威克朗,但挪威石油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与其他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① 挪威统计局对1995年至2022年石油产业、制造业、公共部门及国防业和远洋运输业的工资数据统计表明,石油产业的工资增长曲线与其他三个产业较为相似。虽然石油产业联盟的工资是其他产业联盟的2倍,但这一比值要远低于委内瑞拉等其他主要石油出口国(见图2)。

图2 1995—2022年挪威主要产业年均工资对比(单位:万挪威克朗/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s Norway, “Wages and Employment, by Industry,”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9175>。

^① Rune Dahl Fitjar and Bram Timmermans, “Relatednes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s There a Liability of Relatedness?” *Economic Geography*, Vol.95, No.3, 2019, p.248.

在产业联盟的产值方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有所有产业产值的比例不高,石油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1995年至2022年间,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有所有产业产值的比例平均为14%左右,最高值为2022年的24.48%,最低值为1998年的7.50%。^①与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国相比,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比较低,未出现石油产业一家独大挤占其他产业发展空间的情况。总之,通过上文对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组织构成、人员规模、平均工资、占挪威所有产业总值比例这四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实力没有明显强于其他产业。^②

就产权制度类型而言,挪威石油领域形成了私人产权制度。挪威经济学院教授伊瓦尔·科尔斯塔(Ivar Kolstad)等指出,一个国家要从石油资源中获益就必须建立提高私营部门效率以及促进公共部门问责制的制度,这样才能减少政府及其官员被能源暴利俘获的可能性。显然,挪威出色地践行了科尔斯塔等人的观点。^③在所有权方面,挪威在石油产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私有股份在挪威三大石油公司中占有不同比例的份额。自1985年起,挪威政府调整了原有的能源管理模式,加快了石油产业的私有化进程。挪威最大的石油公司Statoil的大部分石油股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Statoil商业运行相挂钩,进而成为公司资本;另一部分则在1985年后变成SDFI,由Statoil管理,其所得油气收入成为政府直接财政收入。^④2001年,Statoil正式上市进行股份出售,当前政府的持股比例已降至67%。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甚至将Statoil划入“八大国际(私人)石油公司”之列。^⑤第二大石油公司海德鲁公司有65.74%的流通股份。^⑥从法律性质看,上述两大公司的资产未被划定为国家资产,挪威政府也不对其内部固定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第三大石油公司萨嘎公司则始终保持完全私有的产权

^① Statistics Norway, “Production Account and Income Generation, by Industry,”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9171>. 挪威统计局网站对所有产业产值的统计是基于基础价值(Basic Value)的所有产业的产出;而对GDP的统计则基于产值创造地,如挪威大陆(Mainland)的产值。由于本文所使用的石油产业联盟产值与所有产业产值数据出自同一张表,是所有产业产值的一部分,故此处所用指标与使用“石油行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相比更为合理。

^② Erling Røed Larsen, “Escaping the Resource Curse and the Dutch Disease? When and Why Norway Caught up with and Forged Ahead of Its Neighbors,” p.625.

^③ Ivar Kolstad, Arne Wiig and Aled Williams, “Mission Impossible: Does Petroleum-related Aid Address the Resource Curse?” *Energy Policy*, Vol.37, No.3, 2009, p.957.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挪威油气产业发展现状》, <http://no.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209/20120908323591.shtml>.

^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能源政治学中通行的做法是将能源公司划分为“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两者往往分别为私人和政府所有。将Statoil归入“国际石油公司”之列也体现出汤森路透对于挪威石油产业的私人产权制度的认可。详见邱茂鑫、郭晓霞、吕建中:《国际石油公司商业模式的衰落与转变》,载《国际石油经济》,2016年第12期,第11-17页。

^⑥ The Hydro, “Main Shareholders,” <https://www.hydro.com/zh-CN/tou-zh-zhe/the-hydro-share/main-shareholders/>.

性质。

在使用权方面,挪威石油公司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组织管理机构,具有自我管理的权利和能力。萨嘎石油公司等私人企业可以在挪威政府制定的法律规范范围内完全实现自我管理,而在 Statoil 和海德鲁公司等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挪威政府扮演着“被动所有者”的角色。^① 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是以效率为基础,鼓励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积极承担责任,在政府制定的规则框架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自主经营。国有控股石油公司不需向政府呈报年度预算,其一般的投资开发决策和向银行借款也不需要政府部门批准。石油企业的董事大多是具有专业经验的前私营石油企业管理者,从而保证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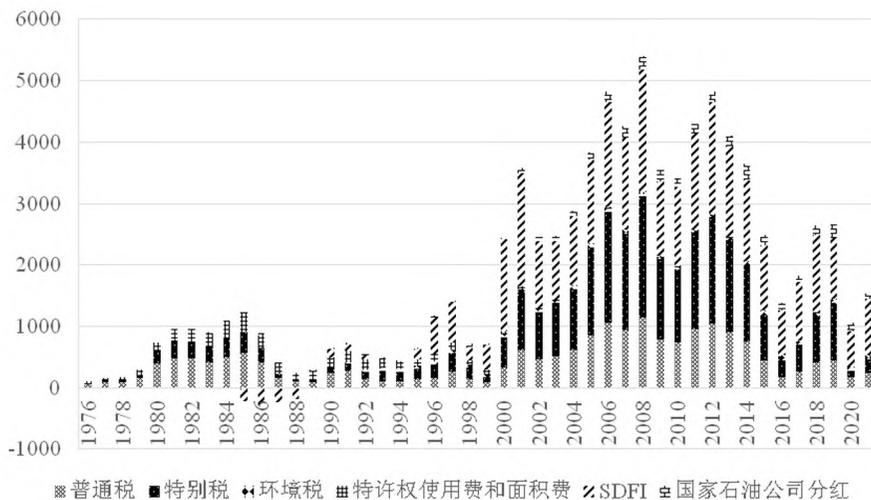
在收益权方面,挪威政府从石油产业获益的渠道清晰且固定,为私人石油企业留下了充分的获利空间。在许可证制度下,挪威政府与大多数海上油气田具有直接利益关系,可获得约占开采企业总收入的 40% 的租金,剩余利益归企业所有。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挪威政府比较注重根据世界油价的波动调节税收,为参与开发的外国石油公司和本国石油企业留下充足的利润空间。如图 3 所示,挪威政府从石油产业获益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特殊的税收体系。石油税收是挪威政府石油收益的最大来源,挪威政府制定的石油产业的税率为 78%,其中包括 28% 的所有产业都需缴纳的普通税和 50% 的特别税。^② 如图 3 所示,石油税收占据挪威政府石油收益 50% 以上的比重。二是挪威政府通过 SDFI 获取资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SDFI 增长迅速,也成为挪威政府石油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挪威国家通过在 Statoil 等公司中的 67% 股份获取分红,该部分在挪威政府石油收益中占比较小。^③

^① Mariana Pargendler, Aldo Musacchio and Sergio G. Lazzarini, “In Strange Company: The Puzzle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State-Controlled Firms,” *Working Paper*, 2013, <https://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10304547/13-071.pdf;sequence=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挪威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初探》, <http://no.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506/20150600998409.shtml>。

^② Petter Osmundsen, “Risk Sharing and Incentives in Norwegian Petroleum Extraction,” *Energy Policy*, Vol.27, No.9, 1999, p.553.

^③ Steinar Holden,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p.872; Erika Weinthal and Pauline Jones Luong, “Combating the Resource Curse: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to Managing Mineral Wealth,”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4, No.1, 2006, p.42; Birthe Eriksen and Tina Søreide, “Zero-tolerance to Corruption? Norway’s Role in Petroleum-related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ly,” in Aled Williams and Philippe Le Billon, eds., *Corrupti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From Resource Curse to Political Ecolog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p.28; Av Sveinung Fjose and Leo Gründfeldt og Atle Blomgren, “Totale sysselsettings- og skatteeffekter av petroleumsvirksomhet i Norge- utsikter til fremtidig vekst,” <https://www.menon.no/wp-content/uploads/11sysselsettings-og-skatteeffekter-av-petroleumsvirksomheten-endelig-rapport-pptx.pdf>。

图3 1976—2021年挪威政府的石油收益(单位:亿挪威克朗)



资料来源:Norwegian Petroleum, “The Government’s Revenues,” <https://www.norskpetroleum.no/en/economy/governments-revenues/#>。

在让渡权方面,挪威石油公司非国有股份均可上市流通,自21世纪以来,挪威政府也多次做出减持石油股份的决定。2001年4月,挪威议会通过决议对 Statoil 进行产权改造,允许部分股份进行自由转让,并建立了佩德罗(Petoro)公司代替 Statoil 管理 SDFI。当年6月,Statoil 在奥斯陆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同时上市,将18.3%的股份出售给国内外的私人股东。2004年以来,挪威政府屡次减持股份,2005年国家在 Statoil 中的持股比例降至70.9%,2017年则达到最低值62.5%。^①此后,挪威政府又进行少量增持,目前,国有股份稳定在67%,挪威的私人所有者持有11.52%的股份,来自英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则持有5%至8%不等的股份。^②除国家股份外,Statoil 的其他股份允许转让,诸如放弃与任何股票发行有关的优先权利、批准合并或分拆和授权增加或减少股本的决议等重要决定必须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投票总数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三分之二的股本的同意。^③上述对挪威石油公司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的分析表明,挪威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政府很难突破产权制度

^① Jørn Håvard Iversen, “Kompleksitet i Norsk Identitet: En Analyse av Norsk olje- og Gassindustri,” Mastergradsoppgave, Universitetet i Tromsø, 2012, p.49.

^② The Equinor, “Our Shareholders,” <https://www.equinor.com/en/investors/our-shareholders.html>.

^③ The Equinor, “The Equinor Book,” <https://www.equinor.com/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html>.

的边界对石油产业进行过度干预。

四 挪威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政治效应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挪威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石油产业联盟,并且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这使得挪威政府和政治家并未在税汇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方面对石油产业形成病态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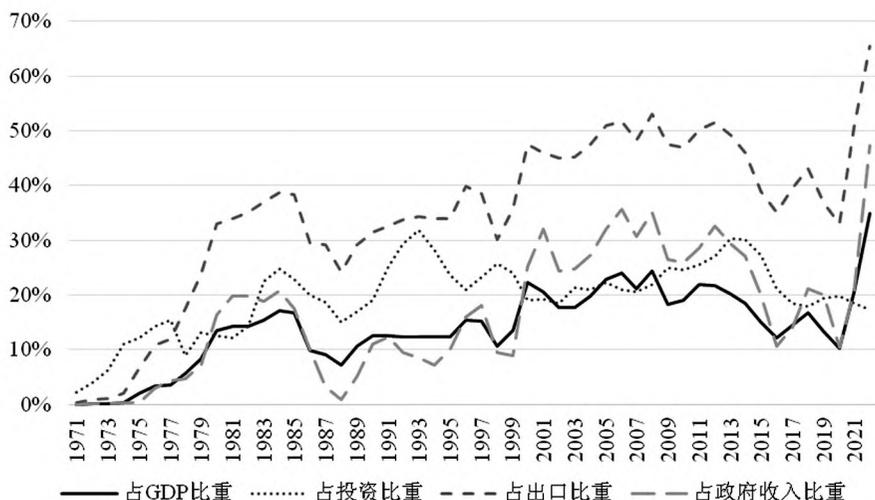
首先,挪威政府未在税收和外汇收入上严重依赖石油产业。就缴纳税收而言,挪威石油税率经过多次调整,石油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和 GDP 的比重也较为合理。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于无法获知国内石油储量,加之挪威企业缺乏能源勘探和开采技术,挪威政府无意对石油产业征收高昂税收以损害外国石油企业的投资热情。1965 年,挪威的石油产业初始税率为 10%,到 1972 年调整为 8%至 16%的浮动税率。由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禁运推高了世界油价,加之挪威政府希望加强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1975 年,挪威政府对石油企业缴纳所得税和特许权使用费后的剩余利润加征 25%的特别税,但石油产业需向政府缴纳的所有税费总和只占石油生产总回报的 20%,可以说石油产业联盟还有可观的利润空间。^① 1986 年,挪威工党政府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对石油行业的税收实行“普通税+特别税”的征收方案,普通税税率为 28%,特别税为 50%,同时逐步取消外国石油公司需要分担的勘探成本和油气生产的特许权使用费。^② 如图 4 所示,挪威石油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在 35%以下,而实行石油国有化的委内瑞拉,石油税收一度高达政府财政收入的 85%。^③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挪威石油税收占 GDP 的比重在 10%—25%之间,占投资和出口的比例也较为合理,由此可见,挪威政府并未对石油产业联盟进行过度压榨,石油税收体系也相对稳健合理。

^①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p.189; Helge Ryggvi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Oil Industry: From Protected National Champions to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s,”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89, No.1, 2015, p.11.

^② Steinar Holden,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p.872; Helge Ryggvi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Oil Industry: From Protected National Champions to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s,” p.11.

^③ Marfa del Mar Rubio-Varas, “Oil Illusion and Delusion: Mexico and Venezuela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Marc Badia-Miró, Vicente Pinilla and Henry Willebald, e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Learning from History*, Routledge, 2015, p.163.

图4 1971—2022年挪威石油税收占主要经济指标的比重



资料来源:Norwegian Petroleum, “The Government’s Revenues,” <https://www.norskpetroleum.no/en/economy/governments-revenues/>。

从创造外汇来看,虽然石油产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但远非挪威赖以生存的创汇支柱。首先,直到1970年,挪威传统的出口支柱海运服务业仍然占国内出口商品产值的41.6%,与木材、矿产等初级资源产品一起,构成挪威多元化的出口创汇结构。^①其次,从挪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值占总出口价值比值来看,1978年至2022年间,平均达到39%。1986年至1988年的世界油价低位期,挪威油气出口的比值仅占国家总出口价值的27%左右,之后随着油价的攀升有所上升。同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的墨西哥,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石油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比例一度高达75%,相比之下,挪威石油产业的出口创汇一直维持在较为健康的水平。^②上述分析可知,挪威政府收入基于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并未过度依赖石油产业贡献超额税汇。

其次,挪威的石油产业联盟未一家独大且在私人产权制度下运行,这使得政府难以片面倚重能源产业承担再分配职能,而是通过建立石油基金来促进产业间的平等发展。德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奥克尚·巴尤尔根(Oksan Bayulgen)指出,挪威政府将巨额

① 田德文:《列国志:挪威》,第122页。

② María del Mar Rubio-Varas, “Oil Illusion and Delusion: Mexico and Venezuela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63; Simon Ville and Olav Wicken, “The Dynamics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orway,” p.1351.

的石油收益投资于非石油产业,通过财富分配和石油基金来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① 1990年,挪威政府建立了石油基金,规定政府获得的石油收益需移交到石油基金统一管理,从而确保石油利益惠及各个产业和所有国民。^② 该基金中的石油出口收入只允许投资于外国资产,以免影响挪威币值稳定和制造业发展。石油基金预期收益的4%将被转移到年度国家预算中,以弥补政府在其他产业的投资赤字,从而平抑了短期石油收入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促进了产业的平衡发展。20世纪末期,挪威政府着手解决大陆架油气资源消耗率升高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石油基金更名为政府养老基金(The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为将石油收入转化为养老福利支出做好准备,这有利于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③

虽然挪威政府对石油行业征收税费的比例与实行国家产权制度的能源国相比较低,但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带动了挪威石油利润的大幅增长,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2019年,挪威石油基金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为政府实施再分配提供了强大的保障。^④ 2005年以来,挪威政府抽调的4%的石油基金预期收益长期高于非石油产业的结构性赤字,为出现赤字的非石油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补贴。^⑤ 另外,挪威政府借助石油基金进行再分配的能力和绩效也明显提升。一方面,挪威政府进行产业布局的能力日益增强,例如,通过价格补偿、关税优惠等产业政策积极推动石油产业的前后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大力支持资源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使石油产业与其他部门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⑥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挪威政府形成深度介入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在促进就业、发展教育事业和缩小性别差距等方面表现良好,其主导再分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⑦

最后,私人产权制度下的挪威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加之石油产业联盟规模有

^①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p.215.

^② Jenny R. Kehl, "Rethinking the Resource Curse: A Review Essay on the Politics of Oil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3, No.3, 2011, pp.495-501; Klaus Schmidt-Hebbel, "Fiscal Institutions in Resource-rich Economies," pp.266-270.

^③ 景普秋、范昊:《挪威规避资源诅咒的经验及其启示》,第148-152页;钟维琼、安海忠、丁颖辉:《挪威油气资源管理流程研究》,载《资源与产业》,2013年第15期,第77-83页。

^④ Francis N. Okpaleke and Magnus Abraham-Dukuma, "Dynamics of Resource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13, No.4, 2020, pp.123-140.

^⑤ Steinar Holden and "Avoid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Norway," p.874.

^⑥ Simon Ville and Olav Wicken, "The Dynamics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orway," p.1350.

^⑦ James E. Alt, "Crude Politics: O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mployment in Britain and Norway, 1970-85," p.187; World Economic Forum, "Lessons from Norway, The World's Most Inclusive 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4/lessons-from-norway-the-world-s-most-inclusive-economy/>.

限,使其很难产生政治干预和寻租腐败行为。其一,挪威政府通过建立石油基金从制度上避免了石油产业联盟将过多资源投入政治选举和寻租;^①其二,挪威石油产业联盟覆盖的人员和占有的资源并不十分充裕,在政治活动中难以形成压倒其他产业联盟的集体行动;其三,挪威政府对石油部门和石油企业的管理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权”结构。1972年以来,挪威政府将石油开发管理中的政策、监管和商业职能分开,形成了石油部门治理的“挪威模式”。^②政府还成立了石油和能源部负责石油生产及投资的重大决策,为石油企业活动提供战略性指导;在挪威石油理事会之下建立自主监管和技术咨询机构,负责汇编石油活动数据以及向石油和能源部及石油企业提出建议;由 Statoil 负责挪威大陆架和国外投资地的商业开采活动。2012年的统计显示, Statoil 负责的开采项目的石油产量占挪威石油产量的70%。^③在石油公司内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挪威国家议会做出决议,禁止公务员担任 Statoil 董事会的成员,从而杜绝了干预政治选举等现象的出现。

同时,挪威的选举有着严格且透明的程序规定,留给石油利益集团的活动空间较小。例如,挪威实行直接选举和多部门成员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原则,登记的各个政党要在选举前列出本党参选名单,名单上的成员在获得一定数量的签名或者上届选举的票数后方可参选。挪威《政党法》规定,政党不能接受以匿名形式或来自国家、其他公共当局控制的法律实体和外国捐助者的竞选捐款。政党必须按照议会规定的记账原则详细记录捐款情况并在指定日期上报。对于超过35000克朗的捐赠应单独报告捐赠者身份和捐赠金额,如果与任何捐赠者达成政治或商业协议,也必须提交相关声明。在选举结束后,任何有权投票的个人可就选举的筹备和进行等相关事项在7天内提出上诉,由国家议会或全国选举委员会直接受理。^④这些规定基本杜绝了石油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干预选举的可能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民主体制和人权办公室(ODIHR)对挪威大选进行了持续观察和评价,其报告从未出现石油企业和利益集团干预或操纵选举的内容。^⑤

① Erling Røed Larsen, “Are Rich Countries Immune to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Norway’s Management of Its Oil Riches,” p.83.

② Mark C. Thurber, David R. Hulst and Patrick R.P. Heller, “Exporting the ‘Norwegian Model’: The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esign on Oil Sector Performance,” *Energy Policy*, Vol.39, No.9, 2011, pp.5366-5367.

③ Helge Ryggvi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Oil Industry: From Protected National Champions to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s,” p.11.

④ The 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Church Affairs, “The Political Parties Act,” https://www.regjeringen.no/globalassets/upload/fad/vedlegg/partifinansiering/political_parties_act.pdf.

⑤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Norway,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1 September 2017: Final Report,” <https://www.osce.org/odihr/elections/norway/360336>.

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当的石油产业联盟以及石油领域的私人产权制度均使挪威在税收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个领域有效阻隔了生成“能源诅咒”的主要病理渠道,实现了石油产业与非石油产业的协调发展。从产值数据来看,石油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0%,与同期委内瑞拉占 GDP 的 30%的石油产值相比要合理得多。^①就挪威的非石油产业而言,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态势良好,并未出现石油产业过度挤占资源导致产业畸形发展的情况。如表 2 所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是挪威传统第一产业的代表,进入 21 世纪后,该产业产值仍实现了翻倍增长;采矿与勘探产业在 70 年代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持小规模增长;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煤气、蒸汽供应是传统第二产业的代表,与石油产业的发展直接相关,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产值增速较为迅猛;海运业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而邮政与电信是挪威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的重要代表,21 世纪初期,其产值近乎翻倍,是挪威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的缩影。综上,挪威从未出现石油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各个产业的发展较为有序和稳健。

表 2 1980—2020 年挪威非石油产业产值(单位:亿挪威克朗)

年份 产业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	41.58	104.12	252.13	483.08	1124.80
采矿与勘探	24.37	44.22	63.77	123.94	160.30
制造业	1484.30	2936.43	4550.32	6728.10	8381.04
建筑业	410.46	865.44	1466.92	3279.69	6344.69
电力、燃气	97.19	283.19	346.61	770.41	716.98
海运	299.46	537.89	875.85	841.80	1090.71
邮政与电信	16.20	68.28	131.84	164.06	197.06

资料来源:Statistics Norway, “National Accounts,”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9171/tableViewLayout1/>。

^① María del Mar Rubio-Varas, “Oil Illusion and Delusion: Mexico and Venezuela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64.

五 隔绝“能源诅咒”:挪威协调的能源产业与可观的经济增长

得益于挪威未出现石油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且政府并未形成对石油产业的病态依赖,使得该国实现长期稳健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一方面,近数十年来,挪威未出现工业化进程受阻的情况,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 ICT 产业在内的更高精尖的产业发展迅猛;另一方面,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对挪威影响有限。

其一,石油产业的蓬勃发展未拖累挪威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可再生能源和 ICT 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绝佳的证明。^① 就可再生能源产业而言,传统能源出口国往往片面依赖化石能源出口带来的巨额利润,很容易忽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而挪威在现代化初期就高效利用了丰富的水电资源支持工业化发展,在石油大规模开发后仍然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尤其是其水电产业在 1960 年至 1985 年达到发展高峰。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水电不仅供给本国 98% 至 99% 的电力资源,还可以根据需求通过互联器向邻国出口。^② 挪威已经通过“北欧电力交换协议”参与国际电力贸易,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六大水电出口国。^③ 此外,挪威政府通过项目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传统的化石燃料公司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新能源的技术发展。21 世纪以来,挪威政府大力推进潮汐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发电,形成更为多元化的能源结构。截至 2015 年,挪威已拥有约 1500 座水电厂,水力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96% 以上,满足了约 60% 的能源需求;核能及其他替代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 40%。^④ 2006 年后,挪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超过其总消耗电量,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储存和出口。^⑤ 2008 年,挪威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所占的比重已高达全部能源消费量的 62%,这

^① 笔者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对贾瑞霞进行了访谈,她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挪威石油产业的发展对其他产业产生了挤压。

^② Lars-Erik Borge, Pernille Parmer and Ragnar Torvik, “Local Natural Resource Curs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31, 2015, p.102.

^③ 田德文:《列国志:挪威》,第 143-144 页。

^④ CEIC:《挪威 No: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百分比》,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norway/energy-production-and-consumption/no-electricity-production-from-hydroelectric-sources--of-total>; CEIC:《挪威 No: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消耗总量百分比》,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norway/energy-production-and-consumption/no-alternative-and-nuclear-energy--of-total-energy-use>; Anne Margrethe Brigham and Jonathon W. Moses, “Den nye oljen,” *Norsk statsvitenskapelig tidsskrift*, Vol.37, No.1, 2021, pp.13-20。

^⑤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in Norway,” <https://www.regjeringen.no/en/topics/energy/renewable-energy/renewable-energy-production-in-norway/id2343462/>.

一数字远高于其他欧盟国家。^①由此可见,挪威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并未受到石油产业发展的挤压。

就 ICT 产业而言,挪威政府较早地确立了该产业的发展方向,并实现了与石油产业发展的融合。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政府成立挪威研究理事会和挪威创新署,以主导能源领域的创新。20 世纪末,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已成为 ICT 产业的主要客户。进入 21 世纪后,挪威政府一直积极推动 ICT 产业的国际合作。仅在 2001—2002 年两年内,挪威的 ICT 公司就与外国相关公司签订了超过 30 项合作协定。^②近 20 年来,挪威着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陆地站、纤维光学、电缆网络和数字传输设施发展完备。目前,挪威已成为欧洲推行综合业务数字网技术(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最先进的国家,行业代表娜拉通信有限公司在 2000 年创造了 25.5 亿克朗的营业额,在世界上 26 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并在奥斯陆股票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挪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2012 年的 6 年间,挪威 ICT 产业产值增长了近 20%;2012 年该产业就业人数达 65500 人;企业数达 16000 余家;创造了 1630 亿挪威克朗的营业额,进而成为挪威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③综上,挪威可再生能源产业及 ICT 产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与石油产业一起实现了迅猛发展,这显然是石油产业并未拖累挪威后续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的有力例证。

其二,得益于产业布局均衡、能源产业在其中占比较小,挪威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石油价格波动对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④首先,当石油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时,挪威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并未挤占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也未出现明显的“荷兰病”效应。例如,2003 年至 2007 年是石油价格显著上升期。该时段内,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 237%,挪威政府的石油收入也由 6328 亿挪威克朗增至 13954 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 120.5%。^⑤虽然挪威的石油产业在高油价的刺激下发展迅猛,但其他产业并未因此受

^① Ann Christin Bøeng, “Konsekvenser for Norge av EUs fornybardirektiv,” *Økonomiske analyser*, Vol.28, No.4, 2010, p.49.

^② Jan Fagerberg, David C. Mowery and Bart Verspagen, “The Evolution of Norway’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36, No.6, 2009, pp.431-444; Olav Wicken, “Policies for Path Cre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way’s Research-driven Strategy for Industrialization,” in Jan Fagerberg, David C Mowery and Bart Verspagen, eds., *Innovation, Path Dependency, and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89-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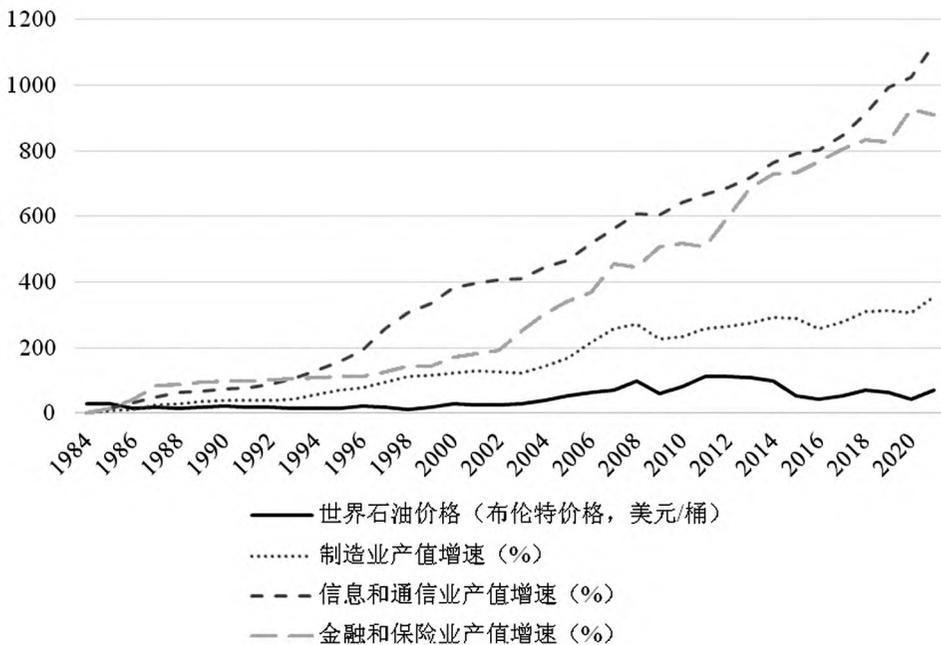
^③ Statistics Norway, “Information Sector, Business Statistics (Discontinued), 2012,” <https://www.ssb.no/en/teknologi-og-innovasjon/statistikker/iktoms>.

^④ Hilde C. Bjørnland and Leif A. Thorsrud, “RINGVIRKNING Norsk økonomi og olje,” https://biopen.bi.no/bitstream/handle/11250/2366310/CME_wp2013_07.pdf?sequence=1.

^⑤ Norwegian Petroleum, “The Government’s Revenues,” <https://www.norskpetroleum.no/en/economy/governments-revenues/#>.

到影响。同期,挪威制造业的产值持续增加,2007年的产值与2003年的初始值相比增长108.5%;金融和保险业的产值也增长明显,与2003年相比增加81.8%;ICT产业与2003年相比增长37.0%。由此可见,在世界油价上涨的背景下,挪威石油收入的增加并未挤占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另外两个油价上升期2009年至2011年和2016年至2018年的情形也与之相似,详见图5。

图5 1984—2021年挪威非石油行业产值增速与石油价格



资料来源: Britain Petrol,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2-full-report.pdf>; Statistics Norway, “Production Account and Income Generation, by Industry,”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9171/>。

其次,当石油价格长期处于低位时,挪威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石油收入减少对其经济的冲击,避免货币大幅贬值和国家债务危机。例如,2012年至2016年是石油价格最明显的下降期,该时段内,世界油价累计下降60.8%。但同期挪威中央政府的总收入仅减少2.5%,并未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反而保持了超过1300

亿挪威克朗的财政盈余。^①同时,油价的下跌也未导致挪威汇率的暴跌,除2012年挪威克朗的汇率下跌1.2%外,2013年至2016年,挪威克朗汇率均有所上升。^②在政府债务方面,挪威政府总债务在5年间上涨26.8%,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8.9%增至38.1%。^③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政府债务的增长是在可控范围之内,2012年至2016年间,其政府债务水平仍低于丹麦、瑞典和芬兰。由此可见,油价下跌并未对挪威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挪威能够较好地应对油价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例如,2008年石油价格经历了非常明显的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在当年第一季度末期和第二季度迅速上涨,最高单日成交价格达147.5美元/桶。此后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在同年12月已跌至36.2美元/桶。即便面临如此剧烈的波动,挪威在2008年4个季度的GDP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由6200亿挪威克朗增至6700亿挪威克朗。^④更难能可贵的是,挪威在2008年上半年各月的通货膨胀率均低于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挪威在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3.8%,低于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这反映了该国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⑤总体来看,由于挪威产业布局均衡、石油产业并非畸形发展,这使得挪威能够很好地应对石油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有效保障其经济的平稳运行。

总之,在石油产业蓬勃发展的加持下,挪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挪威人均GDP在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中排名第三。^⑥得益于石油开发和出口创造的巨大财富,20世纪70年代后期,挪威的人均GDP相继超越瑞典和丹麦,一跃成为斯堪的纳维亚最富裕的国家。^⑦就人均GDP排名而言,自1988年以来,挪威人均GDP始终稳居世界前5位,在进入21世纪后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2位,仅次

^① Statistics Norway, "General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10721/tableViewLayout1/>.

^② Statistics Norway, "Economic Trends,"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12880/tableViewLayout1/>.

^③ Statistics Norway, "General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11560/tableViewLayout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GXWDG_NGDP@WEO/NOR/ISL/DNK/SWE/VEN/MEX.

^④ Statistics Norway, "National Accounts," <https://www.ssb.no/en/statbank/table/09190/tableViewLayout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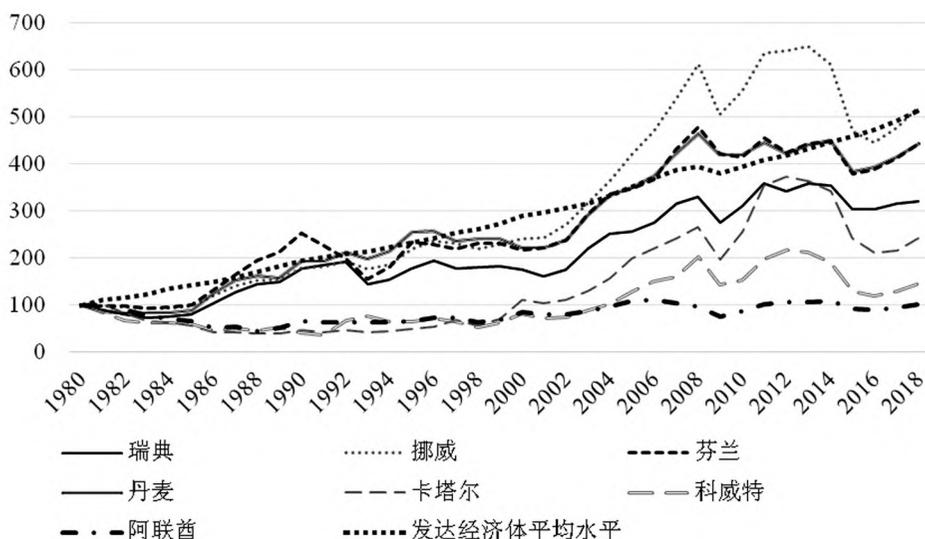
^⑤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rway,"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NOR>.

^⑥ Our World in Data, "Output-side Real GDP Per Capita, 2011 International-\$,"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real-gdp-per-capita-pennwt?tab=table&time=earliest..latest&country>.

^⑦ Sevil Aca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45; Adrian J. Shin, "Primary Resources, Secondary Lab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3, No.4, 2019, p.815.

于卢森堡。^① 统计显示,在与同为石油出口国且初始人均 GDP 水平更高的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对比中,挪威的人均 GDP 在 1980 年至 2018 年间基本保持稳健的正增长,而上述三国则经历了约 20 年的负增长,详见图 6。不难发现,挪威依托石油大规模开发和出口实现了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显然隔绝了“能源诅咒”。

图 6 1980—2018 年挪威及其他主要石油出口国的人均 GDP 增长 (单位:%)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April/>。

注:以各国 1980 年 GDP 水平为基期,统一初始设置为 100。

六 结论

挪威能够有效隔绝“能源诅咒”的根本原因在于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19 世纪 50 年代,挪威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这使得政府并未大规模推动和干预石油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当的石油产业联盟,并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因此,挪威石油产业从未缴纳超额的税收和外汇、直接向其他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April/>。

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影响挪威选举并与政治家进行利益交换。可以说,挪威隔绝了普遍存在于其他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诅咒”病理渠道,由此实现了国内产业的协调发展并形成多元均衡的产业布局。这使其一方面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了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并最终实现了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通过对挪威隔绝“能源诅咒”机制的讨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能源诅咒”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诅咒”的残酷现实。其他能源出口国的政策制定者若要借鉴挪威的经验缓解本国“能源诅咒”的病症,就必须改变能源产业畸大的状态、大力推动非能源产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宏观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产业政策降低能源产业联盟的规模和影响力、循序渐进地在能源领域建立私人产权制度,以此隔绝诱发“能源诅咒”的病理渠道。遗憾的是,其他能源出口国或许只能部分减缓“能源诅咒”的烈度而无法像挪威一样彻底隔绝这一病理现象。究其根源,“能源诅咒”很可能是一种“现代化诅咒”。对于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而言,陷入“能源诅咒”或许并非其能源开发与出口的“诅咒”,而是其开启经济现代化较晚的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宋亦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吴泽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

ture of restraint”, to adapt to the intens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strugg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es of domestic cognition o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xpectations from Germany’s external partners have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s diplomatic role. Germany’s foreign and security strategy papers have frequently mentioned its role of a “shaping power” (Gestaltungsmacht), which not only has a tone of normative power but also contains the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Based o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y’s role as a “shaping power”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ower politic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of Germany’s role as a “shaping pow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o undertake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making more contributions to alliance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o leverage the allies’ power resources and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dominated by the West; to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based 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norms, with an emphasis on value-oriented foreign policy, and finall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based on the common values towards “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hap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However, i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its “shaping capacity” and “shaping willingness”. To become a mature “shaping power”, Germany still needs to overcome a variety of constraints in the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fields.

109 Norway’s Modernization Foundation and Industrial Logic for Blocking “Energy Curse”

SONG Yiming WU Zeping

Norway has outpaced mos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i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large-scale energy exploration and export. In contrast, most of the other energy exporters have been trapped in the “energy curse” of slow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coalitions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ogic with which Norway has blocked the “energy curse”. It can be found that Norway is a country who started modernization process at an early time. Each industry in Norway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in a natural model, and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the oil sector is limited. As a result, a relative bala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oil coalition and the other industrial coalitions and a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as been set up in the oil industry. Thus, the Norwegian oil industry

has never paid excessive taxes or foreign exchange, nor provided excessive subsidies directly to other industries, influenced Norwegian elections, or traded with politicians. This led Norway to have effectively blocked the main “pathologies” of the “energy curse” and formed a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industrial layout. Thanks to the above factors, Norway has succeeded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nergy price fluctuations and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138 The Nordic Resecuritization and Norway's Choice

YUE Peng CHEN Huiwe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bipolarity to unipolarity and then to multipolarity, and the degree of the super powers' struggle for Europe has undergone fluctuations from intensity to moderation and then to intensity, resulting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environment from securitization to desecuritization and then to resecurit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ordic resecuritization that emerged after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Norway is the country of the five Nordic countries that followed most closely the steps of the US and NATO.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Norway's radical position and the measures it takes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confrontation against Russia.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Nordic countries, its geographic proximity to Russia and Russia's offensive inten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Norway's radical bandwagoning, which surpasses the alliance dilemma and prestige-seeking. Norway has chosen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trategy of balancing against Russia, while bandwagoning with the US and maintaining stable relations with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ouble Dichotomous Strategy composed of deterrence and reassurance to Russia and integration and screening to US, Norway has achieved a major balance between Norway and Russia, Norway and US and that between Norway, US and Russia.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hich broke out in late February 2022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resecuritization in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US-Russia confrontation has been further intensified on the northern line.

主 编 冯仲平

学术委员会主席 周 弘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纯 丁一凡 王展鹏 王逸舟 石 坚 冯仲平 冯绍雷 邢广程 伍贻康 江时学
许振洲 孙壮志 李 强 吴白乙 吴志成 时殷弘 佟家栋 宋 英 宋新宁 陈志敏
周 弘 郑春荣 钱乘旦 黄 平 崔洪建 阎学通 裘元伦 戴炳然
阿兰·李比雄(Alain le Pichon) 比扬·威特洛克(Bjorn Wittrock)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 汉斯-格威尔·泽夫纳(Hans-Georg Soeffner)
帕斯夸里·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

编辑委员会主任 冯仲平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田平 冯仲平 叶 斌 刘作奎 孙彦红 李靖堃 张 敏 张金岭 陈 新 赵 晨
胡 琨 程卫东

编辑部总编辑 宋晓敏 **编辑部主任** 张海洋

编辑部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齐天骄 张海洋 宋晓敏 蔡雅洁

国际性 欧洲性 时代性 学术性 中国视角

★ 《欧洲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主办、面向全国学术刊物。它以欧洲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欧洲问题和相关国际问题研究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 《欧洲研究》遵循文责自负的原则，实行匿名审稿制，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本刊反对一稿多投、多发。非经同意、授权或注明出处，本刊所发文章不得以纸质、电子文稿等形式在其他报刊、网站等地方重新刊载或摘编，否则视为侵权。一经发现，本刊保留追究的权利。

★ 《欧洲研究》已加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收录其中，请在来稿中注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版权所有 《欧洲研究》

欧洲研究

双月刊 第 41 卷 总第 240 期

2023 年第 2 期 4 月 15 日出版

□ 欧洲一体化

- 1 议题外溢与形式转换:理解欧洲一体化的动态视角 杨娜 程弘毅
- 27 供应链震荡视阈下欧盟全球资源运筹的战略转向 于宏源 李铭泽
- 50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王天凡

□ 国别与地区

- 78 德国外交角色的变迁:从“文明力量”到“建构力量”? 黄萌萌
- 109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 宋亦明 吴泽平
- 138 北欧的再安全化与挪威的选择 岳鹏 陈慧文

封面题字:周南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is compiled by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Journal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Europe, embracing all aspects of European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content of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represents the views of contributors only.

EDITOR GENERAL

FENG Zhongping

EDITOR-IN -CHIEF

SONG Xiaomin

EDITORS

CAI Yajie

QI Tianjiao

SONG Xiaomin

ZHANG Haiyang

EDITORIAL BOARD

CHEN Xin

CHENG Weidong

FENG Zhongping

HU Kun

KONG Tianping

LI Jingkun

LIU Zuokui

SUN Yanhong

TIAN Dewen

YE Bin

ZHANG Jinling

ZHANG Min

ZHAO Chen

ADVISORY BOARD

Alain le Pichon

Bjorn Wittrock

CHEN Zhimin

Craig Calhoun

CUI Hongjian

DAI Bingran

DING Chun

DING Yifan

FENG Shaolei

FENG Zhongping

Hans-Georg Soeffner

HUANG Ping

JIANG Shixue

LI Qiang

Pasquale Pasquino

QIAN Chengdan

QIU Yuanlun

SHI Jian

SHI Yinhong

SONG Xinning

SONG Ying

SUN Zhuangzhi

TONG Jiadong

WANG Yizhou

WANG Zhanpeng

WU Baiyi

WU Yikang

WU Zhicheng

XING Guangcheng

XU Zhenzhou

YAN Xuotong

ZHENG Chunrong

ZHOU Hong

Compil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Published by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Address: Room 1433, No.5
Jianguomennei Dajie, Beijing,
China

Post Code: 100732

Tel: 00 8610 6513 5017

Fax: 00 8610 6512 5818

E-mail: cjes@cass.org.cn

ISSN 1004-9789/BM 890

Overseas Distribution via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s
Trading Cooperation

P.O. Box 399 Beijing China

Post Code: 100044

Copyright ©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41 No.2 April 2023

ARTICLES

1 Issue Spillover and Form Transformation: Understand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YANG Na CHENG Hongyi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debt crisis, refugee crisis and Brexit,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is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se emerging phenomena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re manifesting themselves as the “issue spillover” in the fields of high and low politics and the “form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upra-nationalism and intergovernmentalism.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se new phenomena within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EU refugee crisis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ntergovernmental to a supranational form in high politics. COVID-19 vaccine procurement embodi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pranational to an intergovernmental form in low politics. The EU digital governance is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spillover of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low to high political issues. And the European space policy can be seen as an extens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from high to low politics. The emerging phenomena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factors such as business interests, norm identif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27 The Strategic Shift of EU's Global Resource Lay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Shocks

YU Hongyuan LI Mingze

The resource supply chai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Russia. The Ukraine crisis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ssia - EU relation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in the energy field, driving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to an energy crisis. In this context, the EU has carried out extensive global resource operations. On one hand, it

has set up a solid energy supply chain by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alliance system and a multi-dimensional resource platform, consolidating the US-EU energy partnership, improving the global green supply chain, and strengthening clean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stitutionalized means such as the commodity trading standards,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tools, carbon border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energy pricing center have been employe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discourse power in the energy field. In essence, the EU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the dual dynamic unification of “open source energy” and “financial discourse” through its global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y.

50 The “Laddered” Model of Digital Platform Regulation: With the EU’s “Digital Services Act” As a Lesson

WANG Tianf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provided different paths on regulatory models and measures for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s. The EU’s “Digital Services Act” has established a progressive regulatory model for intermediary service providers, which starts with the basic obligations of all intermediary agencies, and covers not only the rules for hosting service providers and supplementary regulations for online platforms, but the most stringent obligations for extra-large platforms. In particular, the “super-supervisory” measures set up for such platforms may lead to increased corporate costs,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secrets, and enhance compliance risks.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igital platform regulatory legislation, but it should not become a universally applied “model”. China should set down differentiated platform obligation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needs of its own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build a supervision system that lays equal stress 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tection.

78 Transformation in Germany’s Diplomatic Role: From “Civilian Power” to “Shaping Power”?

HUANG Mengme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e crisis, Germany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in it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Zeitenwende”). However, the Zeitenwende is not only triggered by the external crisi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dynamics which give impetus to the changing diplomatic role of Germany.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Germany, who plays the role of a “civilian power” emphasizing the “cul-

ture of restraint”, to adapt to the intens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strugg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es of domestic cognition o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xpectations from Germany’s external partners have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s diplomatic role. Germany’s foreign and security strategy papers have frequently mentioned its role of a “shaping power” (Gestaltungsmacht), which not only has a tone of normative power but also contains the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Based o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y’s role as a “shaping power”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ower politic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of Germany’s role as a “shaping pow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o undertake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making more contributions to alliance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o leverage the allies’ power resources and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dominated by the West; to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based 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norms, with an emphasis on value-oriented foreign policy, and finall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based on the common values towards “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hap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However, i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its “shaping capacity” and “shaping willingness”. To become a mature “shaping power”, Germany still needs to overcome a variety of constraints in the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fields.

109 Norway’s Modernization Foundation and Industrial Logic for Blocking “Energy Curse”

SONG Yiming WU Zeping

Norway has outpaced mos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i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large-scale energy exploration and export. In contrast, most of the other energy exporters have been trapped in the “energy curse” of slow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coalitions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ogic with which Norway has blocked the “energy curse”. It can be found that Norway is a country who started modernization process at an early time. Each industry in Norway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in a natural model, and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the oil sector is limited. As a result, a relative bala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oil coalition and the other industrial coalitions and a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as been set up in the oil industry. Thus, the Norwegian oil industry

has never paid excessive taxes or foreign exchange, nor provided excessive subsidies directly to other industries, influenced Norwegian elections, or traded with politicians. This led Norway to have effectively blocked the main “pathologies” of the “energy curse” and formed a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industrial layout. Thanks to the above factors, Norway has succeeded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nergy price fluctuations and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138 The Nordic Resecuritization and Norway’s Choice

YUE Peng CHEN Huiwe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bipolarity to unipolarity and then to multipolarity, and the degree of the super powers’ struggle for Europe has undergone fluctuations from intensity to moderation and then to intensity, resulting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environment from securitization to desecuritization and then to resecurit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ordic resecuritization that emerged after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Norway is the country of the five Nordic countries that followed most closely the steps of the US and NATO.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Norway’s radical position and the measures it takes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confrontation against Russia.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Nordic countries, its geographic proximity to Russia and Russia’s offensive inten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Norway’s radical bandwagoning, which surpasses the alliance dilemma and prestige-seeking. Norway has chosen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trategy of balancing against Russia, while bandwagoning with the US and maintaining stable relations with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ouble Dichotomous Strategy composed of deterrence and reassurance to Russia and integration and screening to US, Norway has achieved a major balance between Norway and Russia, Norway and US and that between Norway, US and Russia.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hich broke out in late February 2022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resecuritization in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US-Russia confrontation has been further intensified on the northern line.

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欧洲研究 双月刊 (1983年创刊)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主管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主 编: 冯仲平

编 辑: 《欧洲研究》编辑部

地 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433室(100732)

电 话: (010) 65135017

电子信箱: cjes@cass.org.cn

刊 号: ISSN 1004 - 9789

CN 11 - 4899/C

国内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邮发代号: 82-165)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 890

出 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ISSN 1004-9789



9 771004 978237

定价: 40.00 元